

收到劉以鬯的新版《酒徒》，不免牽起一些零零碎碎的想法：想法既與人有關，亦與作品、香港的文學氣候互相連涉。

陳寶珍「談《酒徒》」的就作品論作品固然好，但站在一個普通讀者的立場，反不若也斯在「現代小說家劉以鬯」一文中，把人與作品連在一起說，來得更親切，又或者充滿評論乾枯以外的某種趣味。

一向以來，談劉以鬯的文字確實不少，但總離不開「意識流」的這個範圍，又或者有些人連「意識流」是甚麼也搞不清楚，就又加入了某種的「叫好」聲中，未免有點令人莞爾，在這金裏，不禁想起有一次與友人去四川遊玩，在成都公園裏聽揚琴演唱，台

# 閱讀筆記

■秦淮

## 劉以鬯與《酒徒》

前有一、二個老人在眉眼低垂，一聽到妙處就大喊「好……好……」如果不是遠離了文革，我還以為那是「布景」處理的一部分。

老人之所以叫「好」，我想是因為他們聽得敬感，又或者因為觸及了某種對文化藝術之共鳴，共鳴的背後，恐怕少不了一層更深的認識，劉以鬯《酒徒》之被叫「好」，果如是麼？大陸某些評論家的文字，我想就不是這種味道。但，也不是沒有認真之作，比如李今洋洋灑灑二萬多字之宏論——「劉以鬯的實驗小說——《劉以鬯實驗小說選後記》」，就不乏可觀之處，也不能否認其誠意之心，不過，用「性」——用佛洛伊德之「性」觀點，來串連起劉以鬯某些作品，是合適宜呢？卻又不無疑問。

提到劉以鬯，也奇怪沒有人把他納入「南來作家」的行列，其實劉以鬯真正正是一個南來作家，他的文學修養、創作技巧，也應該早在大陸形成，但他自一九五七年來港後的一系列的作品比如《酒徒》、《寺內》、《淘瓷》和《對倒》等，無一不是溶入香港社會之作，其實與劉以鬯同時期來港的名作家委實不少，但絕大部不能擺脫「去國離鄉」之情感結，甚至至死方休，相對於劉以鬯，他們的作品就難以提高到比較現代的層次，而仍滯留在一鄉土」的眷戀之

中。

六、七十，乃至八十年代，香港的發展與南來作家的結正迅速地逆向發展，在這個階段，香港社會的工商業正全面邁向企業化、電腦化，或者從市場角度看是消費擴張鼓動的轉型時期，文學如果能夠反映現實的話，這樣出色的作品又有多少呢？劉以鬯《酒徒》與其他以後作品之所以被肯定，意義在此。而在八十年代以前，我們談「南來作家」不多不少帶有尊敬之意，現在，則想到其他方面。

劉以鬯的作品，《酒徒》是一部出色的小說，從「詩」的欣賞角度閱讀，我發現了不少比當時所謂「現代詩人」更現代的作

品，這樣的描段而且不在少數，如：

喝完第一杯酒，有人敲門，是包租婆，問我甚麼時候搬房租。  
喝完第二杯酒，有人敲門，是報館的雜工，問我甚麼不將稿稿送去。  
喝完第三杯酒，有人敲門，是一個不相識的肥胖得近乎腫脹的中年婦人，問我早晨回來時為甚麼奪去她兒子手裏的咬了一口的水果。

讀劉以鬯的《酒徒》，這也是一種方法。

除了《酒徒》以外，我感覺到「對倒」那種平行，並置，又帶有交錯的寫法十分有趣，相反《淘瓷》我就不那麼喜歡了。在《香港短篇小說選——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》（「集力出版社」出版）中，有幸也讀到劉以鬯早期的短篇「赫爾滋夫婦」，與作者以後的佳構相比，這當然不算得上出色，但那一種筆調的冷靜、平實，卻不能不說比同時期的作家少了一份「濫情」與傷他滿透，而劉以鬯作品以後開拓發展，與這點文字情懷的基調很有關係。比如「酒徒」如果濫情過了界，藝術成就恐怕就變成另一種作品了。

從作品再回到人的身上，比劉以鬯先生

年輕一、二輩的年輕作者，很多都受過他的鼓勵。鼓勵我想不是口頭或見諸於文字那種，而是劉以鬯一直在辦副刊與文學刊物，（六零年代初編《時報》的《淺水灣》）、七、八十年代編《快報》的副刊，八十年代末編「星島晚報」的「大會堂」，與及現在編剛過了一百期的《香港文學》大量地容納了年輕人的文學作品，予他們一個自我磨煉的機會。至於我本人，也是在劉以鬯編的副刊上寫過專欄，投過散稿。現在回看當時的作品，真有一點慘不忍睹，真奇怪劉以鬯如何可以容忍我這麼久，「包庇」一個不成熟的年輕人的文字，他當時必也承受了不少來自報館裏內外的壓力，更令我慚愧的是，最近見劉先生他竟然為當年壓了我一篇稿而作出交代，一晃差不多十四、五年了，劉先生還記着這些小節，相對於我們今天的編輯，又未免感覺得有點「霸道」。

有人說劉以鬯櫃中仍收藏有數以十萬計的稿子，不整理出來十分可惜。

又劉以鬯去年發表的「旅行」散文，還滿有趣味與懷有對生命無限的好奇，可見創作的能力潛藏豐厚，假若不編《香港文學》專注於創作，評論，或寫一些三、四十年代作家的回顧文字，對香港，乃至於中國現代文學的意義更大。是的，創作以外，劉以鬯一枝評論之筆，亦往往能發人發省，比如他寫台靜農的小說，便深具卓見，他甚至提出台靜農某些早年的短篇，比如魯迅的「藥」出現更早，就這方面，已改寫了中國新文學的史稿。除了對台靜農獨具慧眼以外，劉以鬯還寫了穆時英的新感覺主義及其「上海的狐步舞」（這比大陸重提「新感覺主義流派」早了差不多二十年），端木蕻良、談《馬伯樂》續編等，予後學者以新鮮的視

覺。

《酒徒》重新整理出版，出得那樣精緻，實在是對作者的一種敬意與肯定。劉以鬯當年曾堅執社會應該對作家的生存負有責任，這一種責任不單止在經濟上予以支援，也在關注上予以同情。但可惜劉先生的呼聲如石沉大海，故他本人亦一度消沉。但消沉是一面，堅執又是另一面，今天，我想劉先生藉《酒徒》的重版而表示由衷的高興是可以理解的，劉以鬯創造了《酒徒》，《酒徒》也創造了劉以鬯，《酒徒》與作者三十年來一直相濡以沫，堅持到現在，也見證到現在，歷史無疑已遷了他們一個真正的面目。

